

# 政治传播与政府新闻学

■ 荆学民

## 一、政府新闻学的学科属性是政治传播

从理论形态上理解,所谓政府新闻学应该是相对于民间或社会新闻传播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新闻学(能否构成有独立研究对象的“学”在此姑且不论)属于政治传播范畴。既然是政治传播,那就要体现政治传播的特质。政治传播区别于一般的文化传播、民间的新闻传播有自己的本质规定性:第一,政党和政府是传播的主体;第二,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第三,要有明晰的政治价值诉求;第四,要有合理的政治价值引导;第五,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性。就此而言,具有政治传播学科属性的政治新闻学虽然不能理解为完全意义上的宣传,却也不能够丢掉宣传的基本特质和其所带来的优势。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全面辩证地把握宣传与传播的关系,防止矫枉过正。

其实,放眼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党政府的新闻传播,无论哪个政党或国家,都不可能淡化更不可能放弃其主体性、政治性、劝服性、灌输性和单向性而单纯注重所谓的“互动”。许多重大的国内或国际政治活动表明,不同政党或国家通过新闻传播所承载的特有政治意图,以及与此相应的灌输性和强制性是新时期政治传播最为显著的特征。对此我们有经验可鉴,也有教训可取。

所以,就目前国内的情况而言,强化政府新闻传播的特有主体政治意识,比所谓改进发布方法、更新发布理念、关注发布对象等显得更为重要。

二、政府新闻发布者不可能没有政治立场,也无法回避自己的政治立场。所谓保持“政治中立”或“价值中立”是个伪命题,是政治虚伪和政治不自信的表现

现在我们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对社会政治生态的判断处于一种“畏惧加迷茫”的状态。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许多社会事件的矛头都可能对准了政府,使政府整体上处于一种不被信任的处境,还不等发布什么,就前提性地被置于质疑甚至被“攻击”的被动地位。因而,政府发言人对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十分畏惧。即便是想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却又不知此时此刻的自己所代表的政府的正确政治立场究竟是什么。表态的畏惧加认知的迷茫,构成了目前中国社会政治发言人的“政治学恐惧”。

深层追索这种“政治学恐惧”,便涉及一个政治学领域的深层认识问题:即目前我们对“公共性”的认识

存在一个较大的思想误区:盲目地迷信和追求“公共性”。这里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这个误区。

现在国内理论界基本认同西方学者哈贝马斯的对公共性的理解,而我们的认识误区正来源于哈贝马斯。的确,哈贝马斯是西方思想界继亚里士多德、阿伦特等人之后对公共性全面、权威论证的思想家。他在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大胆抛弃了哲学对共相的热情,接受历史学家的批评,对18、19世纪的德国、英国、法国的社会历史语境进行详细考察,从中提炼出一种理想的公共性模型。他的核心思想是“公共性是公众舆论、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哈贝马斯对公共性的研究极力要在方法论上体现一种历史研究的特点,即把资产阶级公共性当作一个历史范畴进行研究,但其逻辑上仍然没有摆脱德国传统哲学对事物本质深刻追寻的影子。哈贝马斯将公共性看作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结构,这一整体结构包含着主体—公众,客体—公共权力/公共问题,空间—公共领域,形式—公众舆论,中介—新闻媒介等结构因素。因此,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既是作为社会整体结构的公共性,也是各个结构因素的公共性,而社会整体结构的公共性是由各个结构因素的公共性相互调和转化的产物。

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是一个具有政治功能的理念,这个政治功能就表现在对公共权力的批判上。公共权力构成了公共性的客体。所谓公共权力就是解决公共问题和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对公共权力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阶级性是公共权力的本质特征,公共权力根本是社会代表一部分人利益的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支配和控制。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权力是人类从野蛮迈向文明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权力,它是社会全体公众平等地订立契约所形成的一种联合意志,公共权力体现了一种公意的力量。显然,前者观点所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的现实存在状态,这种情形被后一种观点整合到公共权力的“异化”这个概念下加以批判。公共权力的异化是国家与公众分离的产物,本来属于全体公众所有的公共权力反而成为一种支配公众的强制权力。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显然是反对公共权力的异化的,它以公共权力为客体正是要发挥公众舆论监督的作用,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而公共性实践的过程也恰恰是公共权力的一种行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和卢梭是完全一致的。

在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中,有四个方面的核心元

素：一是公众；二是公共权力；三是公共领域；四是公众舆论。这四个元素的逻辑关系是：公众舆论通过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批判形成区别于国家的社会公众的公共领域。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对公共性的理解是属于“理想型”的，他把“公共”定位于先验设定的国家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中间地带”或“公共地带”。这实际上在逻辑上预设了政府（国家政权）与民众的前提性对立。而实际上，政治本身（政府）就是来源于民众并融入民众的“公共的”。因此，坚持政府政治的公共性并不等于“政治中立”或“价值中立”。而所谓个人作为社会民众也不可能是游离于特定的国家（政治共同体）的“非政治人”。

### 三、政府新闻发布要旗帜鲜明地引导媒体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价值

无论政府新闻发布的因素有多么复杂，政府政党政治组织、受众、媒体是至关重要的三大要素。毫无疑问，媒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样一来，政府新闻发布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媒体而作用于民众。在现实的政府新闻发布中，发布者可能预设了媒体所谓的公共性立场和公共性态度，继而也就预设了自己与媒体的可能性的对立或者距离。在目前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下，发布者首先就处于心理上的防守地位，形成了上述我们所说的“畏惧”、“虚伪”、“不自信”等等。

其实，与政府新闻发布主体一样，所谓媒体的“政治中立”或“价值中立”或“公共性”更是一个伪命题。所以，在这里，我认为，政府新闻发布如何阐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引导媒体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价值导向极为重要。

何以持这种认识和态度，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什么媒体，任何时候、对于任何“事实”的“意见”，都不可能没有其政治立场。

在政治传播的理论上，一般把所谓的“事实”分为三个形态或者层面：客观的政治事实即真实发生的政治事件；主观的政治事实即政治行动者与公民认识到的政治事实；构建的事实即媒体报道中的政治事实。著名政治传播学者麦克奈尔在其《政治传播学引论》中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尖锐地指出“媒体当然不会以一种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方式简单地报道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一切。”<sup>①</sup>

现在一些媒体，消极回避这个问题，因而不能坚持

政治传播中应有的政治立场，对政治事实的报道没有必要的政治价值判断，从而无法引导受众的政治价值取向，最终消解了政府新闻发布的目的和意义。

看来，在理论认识上仍然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再突出，但不能因此颠倒政治传播中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和位置，虚造出所谓的“媒体政治”。现在大家关注的所谓“富媒体，穷民主”的现象，可以说正是政治传播中“政治”与“媒体”关系本末倒置产生的结果。这种认识的发端，要追溯到人们对李普曼192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公众舆论》在政治传播理论中的地位的不恰当推崇上。李普曼之后的拉斯韦尔在其《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提出的“五W”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对李普曼理论的发展，也是对李普曼理论的“修正”。然而，人们只注意了拉斯韦尔对李普曼理论的“发展”，却忽略了拉斯韦尔对李普曼理论的“修正”。

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新闻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负面作用”进行了猛烈的批判。1983年，兰斯·班尼特出版了他的《新闻：政治的幻想》一书。仅从著作的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新闻媒体对政治而言的“作用”：新闻媒体提供的东西已经是远离政治真相本身的虚假的“幻想”。在这部著作中，班尼特从崭新的角度对新闻在政治传播中的本质和作用进行了剖析。他批评当今商业化的媒体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大怪兽，大量的新闻正在脱离政治，他警告未来的公民最好要摆脱媒体的束缚。<sup>②</sup>其后，罗伯特·麦克切斯尼教授在1999年出版了他的《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政治传播》。他在班尼特视新闻媒体为政治幻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证了现如今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里，新闻媒体从政治思想的“幻想”俨然变成了经济上的“富翁”。麦克切斯尼甚至把媒体推到了“反民主”的位置上，并大声疾呼：人们对新闻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负面作用批评已经至少一个世纪了，现在这种“警世之言”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响亮和清澈。<sup>③</sup>

政治传播中，政治是基础，传播是着力点。政府新闻学既然属于政治传播，我觉得，首先需要对“基础”即政治的研究下足工夫，应从“着力点”的传播反推到基础的政治本身；对什么样的“政治”需要更为广泛的、真实的、有力的传播，以及什么样的“政治”更能广泛的、真实的、有力的传播——这些政府新闻学研究中更为根本的方面做足工夫。

注释：

① [英] 麦克奈尔著 《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祺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② 参见[美] 兰斯·班尼特著 《新闻：政治的幻想》，杨晓红、王家全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参见[美]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著 《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政治传播》，谢岳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